

## 《在语言中的盘旋》简介

刘利民

(四川大学 成都 610064)

本书重新审视先秦名家的思想,对名家的“诡辩”命题进行全新的诠释,为名家“专决于名”的思辨理性正名,进而阐明思辨理性不是西方语言、乃至西方文化的专利,它完全可能在汉语语言条件下产生。

全书从现代认知语言学和西方语言哲学的交叉学科视角,构建出“语言性认知操作三模式论”,以论证思辨理性作为一种思维阐释:任何民族,无论其语言形态是什么样,只要进入关于语言表达式意义本身的反思,就可能产生理性思辨性的哲学。基于这一认识,本书探讨西方哲学产生的语言根源,同时对先秦主要思想流派关于语言的哲理思考进行分析,最后产生对名家“诡辩”命题理性主义实质的新解读。

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哲学的确从未提出西方哲学那样的“ontology”问题,没有出现伴随着关于“being as being”的追问而产生的严格的思辨理性。在这方面,西方语言的形态特征,如其重形式的句法、系词的多重意义功能等确实有助于西方思想家由句法进入形而上学的思考。但没有理由因此推之,汉语由于缺乏形式化特征而阻碍了中国发展出理性思辨哲学。语言虽然具有民族特点,各不相同,但是思维却是全人类共同的。汉语与西语虽然不一样,但是中西方人用语言标志的心灵的经验以及心灵的经验所反映的那些东西是共同的。

具体而言,人的认知活动主要体现为认知主体的语言操作,语言操作可以按其问题形态分为3个层面,每一个层面所针对的范畴不一样,因而产生的问题也不一样:(1)在具体操作语言层面,人用语言对世界进行经验和操作,语言的意义以直接感知的事实而确定;(2)在抽象概念化操作语言层面,人用语言对来自感知的材料进行抽象操作,以获取关于世界事物本质属性的认识;(3)在形而上语言层面,人用语言就语言本身进行追问,以反思语言意义的确定性;这实质上是对知识的确定性的哲学反思。本书认为哲学是普遍的,因为人类的认知具有普遍性。

西方哲学的 ontology 本身就是从这种关于语言的结构和意义的操作中盘旋出来的形而上理性思维;古希腊哲学正是从对语言的思辨中形成关于什么是“是”的形而上思想方法。作为关于概念的逻辑分析的理性主义思想模式并不一定只能有从关于“是”的思辨中产生这一种路径。只要不是囿于经验性认知操作,而是进入语言抽象性认知操作,那么理性主义思想应该能够在包括汉语在内的任何语言土壤中产生。事实上,中国哲学家确实曾经通过纯语言思辨试图进入理性思辨。在先秦“名实之辩”运动中独树一帜的名家哲学就是很典型的语言逻辑的思辨性哲学思考。

本书对《公孙龙子》的5篇文章以及庄子所记录的名家“诡辩”命题的分析借用“使用”“提及”的语言哲学分析技术,并加以创新性运用,合理地解释公孙龙等先秦思想家之所以提出“诡辩”命题的原因:古汉语缺乏标点符号、形式化的词类、句法标记,使他们不得不以这种方式将自己的思考划定在概念层面,而不是具体所指层面。本书不仅合理地阐释名家思想的理性主义思想倾向,而且指出中国古代思想通向关于本体论、认识论问题的哲学思辨的语言路径。

遗憾的是,由于古汉语缺乏标点符号和西方语言那样的形式变化,名家的哲学思想不易被人所理解,给人以玩奇辞,以相绕滑的印象;同时,先秦哲学对于人伦、道德、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及其入世的、经世致用的精神使名家的理性思辨倾向颇具另类色彩。虽然名家本身也是从“名”与“实”的关系入手进入抽象思考,但其类似于异端的思维模式却招来批判与拒斥。这是中国古代没有能够在语言中盘旋出以本体论、认识论为核心的理性主义哲学的根本原因。